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鄭子瑜 著

港台書室

H15
981

鄭子瑜教授著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大濱信泉題



80388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鄭子瑜著．——一版．

——臺北市：書林，民85

108面；21公分

ISBN 957-586-621-5(平裝)

1. 中國語言-修辭

802.7

85003552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定價：100元

著 者／鄭子瑜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二F-5

電話：3687226 FAX：3636630

發行人／蘇正隆

郵 撥／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國榮印刷廠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一 版

ISBN 957-586-621-5

善。如者不善，不善者如。他認為美言都是虛
偽的，不可相信的，他痛恨虛偽，所以反對美言。
但我們所謂美辭學，是要居一切修辭之美，來
感動人，希望能夠收到說服或是感化的效果，却
未必是虛偽的，不可相信的。你看老子自己的道
德經五千言，就得那麼美好，那麼精妙，可見
他並不是真正反對美辭學的。所以周朝劉勰，
在他的《文心雕龍》清辭篇論道：「老子疾偽，以修美
言之法，而五千精妙，則非美辭美言。此是美
在的語。」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目次

自序

一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一
二	「修辭」的含義	五〇
三	修辭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五八
四	論「照應」	六三
五	漢文特殊的修辭技巧	七二
六	古書辨惑	八七

一 中國修辭學的變遷

——一九六四年五月卅日在東京中國語學研究會的演講辭——

諸位教授先生！諸位先輩！中國語學研究會本月的例會在早大舉行，輪到早大的同人來講演；早大的幹事先生，便推舉蘆田先生和我來說話。現在我要說的是「中國修辭學的變遷」，這是嘗試的一篇；因為時間匆促，參考書一時不能看得完，加以我自己學力的不足，掛一漏萬和錯誤的地方，一定是難免的。希望諸位先輩多多指教！

談到中國文學的變遷，有中國文學史；談到中國哲學的變遷，有中國哲學史；談到中國史學的變遷，有中國史學史；談到中國文學批評的變遷，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只有中國修辭學却直到現在還不會有「史」。也許有人以為至今為止，中國修辭學比較有系統和比較像樣的著作，還是寥寥可數；一九三二年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出版，對中國的修辭學來說，不但空前，（據劉大白的序言說：「中國人在說話的時候，修了幾百萬年的辭，並且

在作文的時候，也已經修了幾千年的辭，可是一竟並不知道有所謂有系統的修辭學。直到一九三二年，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出來，才得有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語文今語文的修辭學書。」而且也絕後了——因為到現在還不會有像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那樣有價值有分量的中國修辭學新著出來。所以嚴格地說來，中國的修辭學，只有一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那裏有修辭學史好寫呢？但我們如果把衡量修辭學的尺度放得寬一些，了解任何學術，必先有它的萌芽時期，然後逐漸發育，逐漸生長，才有茁壯和發揚光大的日子；那麼對於上古以來，那些論文、隨筆、雜記、詩話、經解之類的著述中有關修辭學的話，即使是片言隻語，也可看作是中國修辭學史的寶貴資料；雖然絕大多數的作者，一路來並沒有把修辭當作一種專門的學術來研究，他們不過偶爾涉及罷了。

在修辭學的專著裏，約略提到中國修辭學的變遷的，據我所知，島村瀧太郎（即島村抱月）的新美辭學，有「東洋美辭學」一節，不過只有寥寥數語簡介詩經（六義）、文心雕龍、文則、滄浪詩話、文體明辨和讀書作文譜這幾部書和修辭學的關係而已；陳介白的修辭學講話，也有一段說到中國修辭學的變遷。我這篇講辭可以說是中國修辭學史的嘗試

之作，不過略具雛形而已，希望以後會有人寫出真正的中國修辭學史來。

一 先秦諸子的修辭學觀（註一）

爲了時間上的限制，我在這裏只大略談談儒道墨三家對修辭的意見。

道家老子似乎是反對辯言的，他和後來的禪宗一樣，主張實行身教，把嘴巴掛在牆上。他說：「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矣。」可惜的是這種不言之教，天下的人很少能够做得到。又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他根本不願多言，何況是美言呢？他對美言的看法是這樣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他認爲美言都是虛偽的，不可相信的，他痛疾虛偽，所以反對「美言」。但我們所謂美辭學，是要盡一切修辭之美，來感動人，希望能收到說話或是寫作的效果，却未必是虛偽的，不可相信的。你看老子自己的道德經五千言，寫得那麼美好，那麼精妙，可見他並不是真正反對美辭學的。所以梁朝的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情采篇說：「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這是實在的話。

後輩道家莊子對修辭的意見，和老子大致是相同的。在逍遙遊篇中，他曾經借古代的懷道者肩吾批評楚國隱士接輿說話的技巧說：「吾聞之接輿，大言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及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變動最激烈的時代，因為戰爭的影響，有許多的封建領主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特權；當然也有不少的新興領主出現。老子和一些道家的信徒都是破落的封建領主，他們既已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特權，眼看一些新興的領主階級在享受他們的特權，自然要大起妬嫉之心，希望大家都能回到原始的社會去，過着那不分貴賤的生活。從這一觀念出發，自然要反對文明，反對進步。反對美辭不過是反對文明與進步的一端罷了。

儒家孔子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生在遊說之風獨盛的時代，是不反對修辭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引孔子的話：「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他以爲言辭如果沒有文采，是不會流傳久遠的；要辦理國際交涉，不靠文辭，也是不會成功的。他甚至主張用巧妙的言辭。禮記表記也曾引

孔子的話：「情欲信，辭欲巧。」但這所謂巧，是婉曲的意思，與「巧言令色」的「巧」不同；對於巧言令色，他是深惡而痛絕之的。

孟子則主張「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他以為修辭應該適可而止，如果文飾過度，反會害了辭意，使人不容易明白。這是很好的意見。但他的話也就只有說到這裏為止。如果他肯再發揮，大可以寫成一部很有價值的修辭學專著呢。

荀子也鄙視過度的文飾。在非相篇裏，他說：「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他以為鄙夫「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卑汙庸俗。」但是有限度的修辭，好像用比喻吧，他却以為是「談說之術」所應該採取的方法。所以在同一文裏，他又說：「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墨家看重功利，主張身體力行，所以反對修辭。我們從韓非子外儲說中，可以窺見墨家的修辭學觀：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不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言，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贊同墨子對於修辭的觀點，所以才要引用這個故事。可是他在說難一文裏，却又以爲非辯其辭不爲功。

（註一）按島村瀧太郎的新美辭學，以爲詩六義中的賦、比、興，是詩的措辭法，是中國修辭思想的萌芽。陳介白的修辭學講話也從其說。六義見於毛詩序，而詩序的作者究竟是什麼人，可信與否，現在還是聚訟紛紜，所以暫不加以引敘，而就先秦諸子的修辭學觀說起。

二 漢代修辭學的兩極端

漢代的大編輯家劉向，在元帝時曾數上書言天下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譏刺

時事，指陳災異；只因那時候外戚王鳳專權，屢次誹謗他，劉向終於沒有被「君上」所器重。可是劉向並不灰心，也沒有因此改變了他的「志願」。他悟出了自己的陳辭太切直了，太沒有講究修飾了，這也許是失敗的一大原因吧？因此他寫了一篇善說，後來收入在說苑裏，開頭便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懣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

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最後兩句話說得最是透徹明白，原來辭是不可不修的，而修辭的目的，是爲了使遊說時能說得好，能爲人君所重用。這真是劉向的由衷之言。但漢代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賦，也真能與劉向的修辭學說相配合；可是文飾鋪敘超過了常度，把文章辭賦當作揚才露己的工具，作家們都在文字技巧上用工夫，而不惜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例如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寫陳皇后深宮寂寞，企望孝武皇帝再駕幸，真是極盡藻飾形容之能事，而且也無聊到了極點。

稍後偉大的思想家王充出來了，他不能容忍這種疲靡不振的文風，首先揭櫫了形式原於內容的觀點，他認爲形式與內容應該「外內表裏，自相副稱」，不應該只顧形式的雕琢，而忽視了內容的真實。在論衡的超奇篇中，他說：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現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則是五色之禽

毛妄生也。」

他更反對美辭（即「華文」），在對作篇中，他說：「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他又採取了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的論點，寫了藝增、語增諸篇，極力反對在文學作品上用誇張辭。他列舉了「世俗增言，儒書增其文」的事例，如書「協和萬國」，詩「子孫千億」，傳語「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斛」，等等。他以爲這些誇張的現象，都是「華文飾詞」的結果，是「失其實誠」的「虛說」。所以蔣祖怡在論衡選說他「要求把文學作品中的真實和生活中的真實完全等同，這就是樸素唯物論觀點的歷史局限性。」（註二）但是，王充並沒有完全否定形式的作用，對於那些文情並茂的作品，他還是重視的。所以在對作篇中，他又說過這樣的話：「人如無文則爲樸人。」這種論調，看似矛盾，實是調和，因爲他所反對的只是「華而不實」的文章罷了。

（註二）論衡選（蔣祖怡選註，中華書局版）前言。

三 魏晉的修辭學

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是大家公認的一篇最早的專講文學批評的論著，文中涉及修辭學的部分，只有如下的幾句：「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文體既不同，作用也互異，爲了適情應景，於是有各種不同的修辭標準。

可是，徐幹却把這一個論據應用到待人處世的投機和圓通的方法上，其中論貴言第六云：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

這意思雖然一半是由孔子的「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的話推衍而來的，但一半却將曹丕的論文體與修辭的關係，應用到「巧言」這一技巧上來。

晉代陸璣的文賦，論文體與修辭的關係，要比典論論文詳細得多了：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他一面繼承了曹丕的論點，一面也提出自己對於修辭與謀篇的主張，那便是以禁邪、制放、辭達、理舉爲要務，而不以冗長取勝。

文賦裏還有論及修辭的部分。如：「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以爲文章應該顧到倫次通順這一消極修辭的必要條件，不要爲着「言順」而妨害本意。又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却是談到「警策」的修辭法與文章主題的關係。至如：「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却又是談到比喻的修辭法與文章情貌的變化多端。陸璣本人，不但提出了修辭學的理論來，就是他的作品，也高度表現了積極修辭的手法。他的與長沙顧母書，便因爲應用藏詞法而被顏之推所批評。

晉代又有摯虞作文章流別志論，散見於各種類書中，有關修辭的部分可不少。如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他主張文章應以情義爲主，如果麗靡過度，便與情義相悖，便無足取。這種理論，實在是後來劉勰「文附質」（文心雕龍情采篇）的理論之所本。

四 南北朝的修辭學

梁代任昉著文章緣起一書，敘述文章的源流體製，間有涉及修辭的地方，如對問、達旨、離合、連珠諸體都是。現在舉「連珠」一體爲例，緣起引傅元的話說：「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